

《红色中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喉舌”

□陈安 彭小青



《红色中华》创刊号。(资料图片)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也在这一天成立。它首次播报的新闻就是关于“一苏大会”召开的消息。12月11日(即广州起义四周年纪念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在瑞金叶坪一所简陋民房里创刊。

《红色中华》创刊宗旨是,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从而达到全国的胜利。创刊之初,《红色中华》编辑部仅有三四人,栏目主要有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中央苏区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红角、工农民主法庭及突击队等。

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红色中华》在创办过程中一直动态调整。在机构和负责人方面,1933年2月起,《红色中华》改为中共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局、少共中央局的联合机关报。周以栗、王观澜、沙可夫、谢然之、任质彬等先后任编辑部负责人兼主编。1934年1月后,瞿秋白兼任社长。《红色中华》在创办之初为周刊,从第50期起改为3日刊,第148期起又改为每周3期;第1期仅出四开两版,第2期起为四开四版,以后一般每期六版或八版,皆为铅印。直至1934年10月3日,即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红色中华》出版至第240期。中央红军长征后,时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瞿秋白克服困难继续编辑出版《红色中华》,至1935年1月21日编至第264期。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复刊了《红色中华》,由于通信困难并不清楚瞿秋白继续编发了《红色中华》,陕北版的编委们仍按照离开苏区时的编号从241期开始编发。1937年1月29日,《红色中华》出版了第325期,开始更名为《新中华报》。

《红色中华》是中央苏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通过基层通讯员,把报纸发送到苏区每个角落;发行量最大时,每期近4万份,超过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发行全国的《大公报》,成为中央苏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份党报。这缘于中央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办好《红色中华》的高度重视。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和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中央各部门、各省负责人,经常指导、询问报社的工作,经常给《红色中华》写社论、专论和通讯,或者主动给报社提供重要信息和文字材料,因此《红色中华》的政策指导性很强。

《红色中华》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宗旨和职责,出色地完成了党和苏维埃政府赋予的光荣任务。它不仅以大量的版面刊登、宣传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重要法

律、法令和文告,刊登、发布对全国各苏区各项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社论和评论,同时还及时报道苏维埃中央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和一些重要事件的内容;刊登了不少对苏区工作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先进单位的典型事迹和经验;动员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拥护苏维埃政权和拥护红军、参加红军;揭露批评苏区党政机关不正之风的重要文章、报道;大力报道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

比如,在开展工作指导方面,《红色中华》通过组织与编发相关的文章,对各级基层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以达到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的目的。1932年4月,张风元在《红色中华》发表《转变区乡苏维埃政府工作习惯》一

文,提出反对松懈散漫现象,养成积极的有组织有计划的习惯,“是目前苏维埃政府的一个重要工作”。他的这些指导性意见,对于走上苏维埃工作岗位不久的工农干部,是非常及时且十分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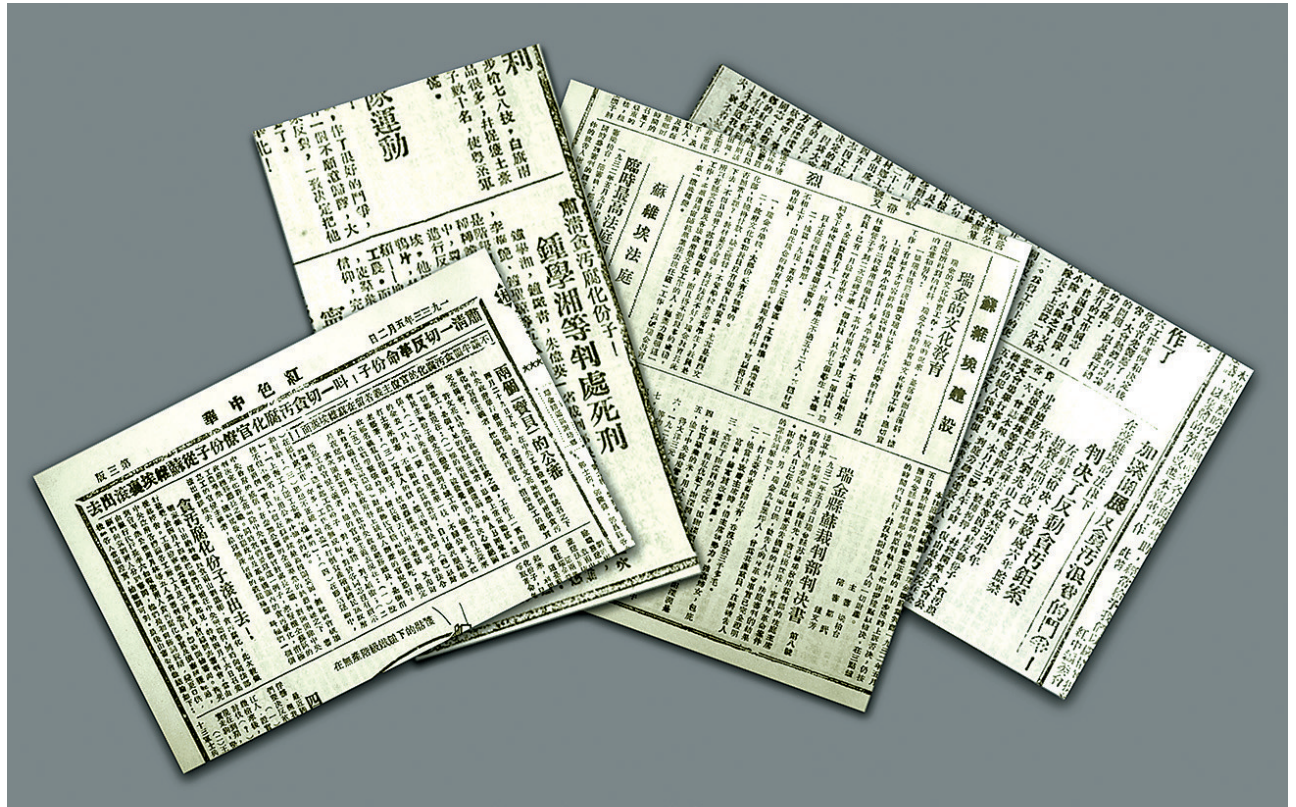
在扩大红军运动中,《红色中华》善于抓住典型事例,大力赞扬或严肃惩戒,收到以点带面或敲山震虎的宣传效果,发挥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1932年11月,《红色中华》报道了胜利县全体群众自动慰劳伤病战士的盛况——胜利县十六万工农群众的大队慰劳代表一行五十人,各担着全县群众的慰劳品“鸡子,鸡蛋,猪子,草鞋等数十扣”。手执红旗,敲锣打鼓地向医院去。1933年8月31日,《红色中华》刊登的《瑞金下肖区官山乡红军家属致前方红色战士的信》中说:“苏维

埃给了我们一切,他是我们的生命,只有苏维埃才能拯救我们,你们应该为苏维埃运动而奋斗到底!更加努力,千百倍地努力杀敌!”

在舆论监督方面,《红色中华》通过批评的手段提示现实中的问题和错误,以促进工作积极健康开展。《红色中华》对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批评,主要是通过“苏维埃建设”“突击队”“铁棍”“铁锤”“党的生活”“轻骑队通讯”“生活批判”等栏目实现的。此外,《红色中华》还设置了一些集中刊登专题性批评稿件的动态版面。比如,《红色中华》第134期第三版在通栏标题“开展广泛的反贪污斗争!肃清一切苏维埃的毒贼”下,刊登了9则与反贪污相关的文字。

这些内容在当时的新闻宣传中独树一帜,因而十分有效。这对于推动苏维埃政府各项工作、促进苏区各项建设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同时对于正确引导战时舆论、激励工农群众扩军备战也产生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红色中华》植根于工农群众之中,为工农群众利益奔走呼喊,被读者亲切地赞誉为“我们苏维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现”“全苏人民的喉舌”。它的创办,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红色中华》出版百期之际,多位中央领导同志撰文祝贺,期待它“更变成群众的报纸”,更成为群众运动的“先锋”。据统计,包括《红色中华》在内,苏区有近300种报刊,内容丰富多样、形式生动活泼,不但对组织和引导工农群众参加苏维埃各项建设事业、扩大红军队伍、深入推动土地革命,打破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等,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丰富了工农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向前发展。



《红色中华》刊登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资料图片)

毛泽东,一生只活了47个年头。前25年,他是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后22年,他投身革命,成为中国红色金融事业的开拓者和先驱。毛泽东的名字,两次印在中国红色金融史册上:一次是以总经理身份出现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股票上,另一次是以国家银行行长身份出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上。

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经济建设决议案,其中特别提到要创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可是,由谁担负创办银行之大任呢?众人经过仔细思考,细心比较,觉得毛泽东比较合适。因为毛泽东在萍乡、安源、上海、天津等地从事过党的理财工作,积攒了大量的金融经验,并且他热忱积极,点子多,肯钻研,活动能力很强,是最合适的人选。经过认真讨论,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任毛泽东为财政委员会委员,筹办国家银行。

毛泽东把缴获的战利品中有关经济的书籍、账册、表格收集起来,给银行工作人员办培训班。不久,毛泽东又在老上烧田契时,捡来了一本字迹模糊的《经法学》,使他学到了不少金融理论知识。按照原先的计划,国家银行成立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会应该拨款100万元,但实际上“成立时注册资本仅有20万元,且在成立后的几天之内因为战争需要被全部划出”。为了解决存款问题,毛泽东大力组织存款,将没收、税收、捐款、罚款、盈利等款项聚集到金库,办理机关、企业、红军部队和个人的储蓄,想方设法让银行运转起来。

由于毛泽东的组织协调得力,国家银行甚至组织起了没收委员会,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没收征集委员会就会随部队到前方筹款。1932年4月20日,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漳州城,毛泽东也率领没收征集委员会随军来到漳州,这次筹到的100万元现款成为国家银行的第一笔大额资金。

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苏区流通的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光洋、国民党的纸币,甚至还有清朝的铜板。货币市场非常混乱,给国民党方面破坏苏区的金融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发行苏区统一的货币是当务之急。但是,要印制统一的苏区纸币没有原料怎么办?毛泽东就亲自挑着箩筐,走村串户收破布、烂棉絮和烂麻袋,并发动职工上山砍毛竹、剥树皮,然后用铁锤、石碓捣成浆,在酸碱水中浸上七天七夜,造出了白细质韧的造纸用浆。为了寻找纸币设计者,毛泽东听说有个名叫华广的同志会绘图,便赶紧借用。对印钞票的油墨和新机器,毛泽东也想办法,通过白区商人程度生赴上海、香港购买。就这样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有1元、5角、2角、1角、5分五种票面。1932年底,国家银行的纸币发行额为65万余元,可以充分兑换现洋,信用好,币值一直保持稳定。11月7日,《财政人民委员会一年来工作报告》指出,纸币正在发行,银币也已开铸,纸币在群众中已有相当信用。

但是,毛泽东依旧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担心苏区纸币的防伪问题。为了解决防伪问题,毛泽东日夜苦思冥想,连煤油灯烧了毛衣都没发觉。孜孜不倦地探索,使他有了灵感,那就是在造纸时将一定量的羊毛放到纸张中,这样既可以透视纸币鉴别,又可以撕开或火燎纸币,通过嗅羊毛的臭味,来辨别真伪。这样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货币的正常流通,稳定了苏区的金融。

在发行纸币的同时,国家银行还开始酝酿制造银币。一天,毛泽东拿着两张银币图样来到造币厂。厂长谢仁仁仔细看过图样后,激动地说:“这回可好了,我们苏维埃共和国也有自己的银币了!以后再也不用铸什么‘大洋’‘小洋’了。”毛泽东诙谐地笑道:“银币要铸,银洋也要铸,银币只能在苏区流通,我们还要到白区去买东西呢!”当时的中国,币制尚未完全统一,金银本身就是硬通货。中央苏区银币的出现,大大方便了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往来。

在开创党的金融工作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金融经验,也遇到不少困难。例如如何制定会计、预算、决算和审计制度,如何废除高利贷剥削,如何调剂资金余缺,等等。为了破解这些问题,毛泽东集思广益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九条宗旨:一是摧毁反动的金融体系,废除高利贷剥削,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二是打击奸商的破坏活动,防止金银外流;三是统一货币制度,建立自己的造币厂,发行适当数量的纸币;四是开办机关、企业、红军部队和个人的储蓄,扩大银行股金;五是经济效益好的厂、矿、合作社发放贷款,扶持各项建设事业;六是改善经营管理,从宏观调剂资金余缺;七是办理兑换业务,管理现金,并代理金库;八是组织信用社,帮助工农群众兴办各种生产合作社;九是保障贸易,繁荣市场,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为革命战争服务。

有了宗旨,就有了方向,有了方向,就有了动力。国家银行的有效运行,促进了中央苏区各省、县、市、支行的建立。福建分行和江西分行还设立了多处兑换处和收买金银处,各县政府、各军经理机关也设立了代兑处,中央苏区从上到下形成了完整的金融体系。金融工作的出色表现为中央苏区的经济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巩固和壮大了苏维埃红色政权。

毛泽东为苏区工农、为红军理财和资金融通,为中央苏区金融事业费尽心力,兢兢业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常说:“我们是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银行要有金山银山做靠山,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证银行供给。

红色金融先驱毛泽东

□李明胜

为革命史册增光的吴朝贵

□钟强



员。随后,廖昌志、朱子风、朱子栋等进步青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西华山支部成立,吴朝贵任支部书记。不久,根据上级党组织关于加强西华山工人运动的指示,西华山支部作出建立赤色工会的决定。吴朝贵带头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工会会员。他向工人讲解只有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成立属于工人自己的工会,才能不受保卫团的欺负、压迫。正当工人们纷纷加入赤色工会之际,保卫团从中作梗,散发传单,恐吓工人,“谁加入赤色工会,谁就别想在西华山挖砂子……”为此,吴朝贵组织工人,将暗中散发传单的保卫团王英茂抓住,举行了“公审”大会,揭露了保卫团破坏工人运动的阴谋,并号召广大工人朋友积极参加赤色工会,保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赤色工会很快就发展到1000多名会员。

5月,西华山赤色工会正式成立。此时,大余县内多家收砂公司开会,决定联合起来控制砂价,向省政府申请包办收购,不准收购砂外运,致使砂价急剧下跌,由原先的每担24块银圆压低到每担14块银圆。西华山的矿山工人面临饥饿威胁,人人愤慨,个个咬牙。于是,吴朝贵领导赤色工会作出开展打倒“包办”斗争的决定,号召工人“我们不能再任他们宰割了,我们工人要

团结起来,打倒包办!”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沉重打击了资本家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工人的合法权利,鼓舞了矿工的革命热情和斗志,也扩大了工会和党组织的影响力。10月,西华山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并成立了中共西华山区委,吴朝贵任区委书记。

1931年1月上旬,罗贵波率领红三十五军一部,占领了大余县城。吴朝贵利用这个大好时机,立即组织武装起义。一天的傍晚时分,吴朝贵带领起义工人,趁着夜色,进入靖卫团周文山连队营房,收缴了靖卫团的30余支枪支和一批弹药,将靖卫团赶出了西华山。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为重新控制西华山,组织部队进攻西华山。由于敌众我寡,为保存实力,吴朝贵率领工人游击队撤离西华山,向龙回苏区靠拢。

在部队行进途中,遭到反动武装阻击,部队被打散,吴朝贵不得不秘密转移到南康。不久,吴朝贵回到西华山,联系原有党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重新组建了7个党支部,并根据赣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于1931年6月成立中共西华山区委,吴朝贵任区委书记。

同时,西华山区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起义计划。会后,吴朝贵等领导人积极组织队伍,准备武器。手榴弹不够,就用烧酒瓶装上火药,制成土手榴弹;枪支不够,就自制梭镖、鸟铳。还派出共产党员打入周文山部,开展兵运工作,配合进行起义。8月中旬,吴朝贵跟随叶修林前往驻扎新城的红十一师领取枪支,当行至青龙时,忽然听闻红军已经退出新城,新城重新陷入敌手。吴朝贵与叶修林只得经油山退往广东南雄,再绕道潜回西华山。此时,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军余汉谋部入赣“剿共”。国民党部队到处搜捕、巡逻,西华山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吴朝贵只得回到工人当中,等待时机。

1932年6月11日,吴朝贵正在工棚里教工人唱《国际歌》,忽然一群穿便衣的国民党特务闯了进来,将他逮捕带走。被捕入狱后,敌人对吴朝贵进行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吴朝贵始终不为名利所动,没有向敌人透露半点有关党组织的消息。6月13日,吴朝贵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向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壮烈牺牲,年仅23岁。6月18日,中共西道委在上犹前为吴朝贵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称赞他为革命史册上增添了闪光的一页。